

【论 文】

影响西藏“热振事件”走向的真正原因¹

——兼谈国民政府对事件的处置

喜饶尼玛、冯翔²

摘要: 1947年发生的西藏“热振事件”是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学界研究成果丰富，多认为热振呼图克图是一个倾向中央政府的爱国人士。但他被西藏地方政府拘押致死，中央政府何以处置手段软弱，则多语焉不详。主要的观点认为，是因为国民政府忙于内战，无暇西顾，噶厦遂在英国人挑唆下，任意非为，使爱国内向力量受到严重影响。实际上，根据新的档案史料，细考历史，则发现其中另有蹊跷，值得深思。

关键词: 民国西藏；热振事件；治藏策略

谈至1946年就已初露端倪，1947年最终发生的西藏“热振事件”，学界多认为在国民政府方面，主要是由于内战全面爆发，在宣布全面“戡乱”和国民党军队逐渐由进攻转为防守的时候，中央政府着实无力营藏。[1]而这也恰好为西藏地方政府洞悉，成为其敢于发动“热振事件”，并不遵中央电令的一个原因。事件发生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不仅不予问责，反而承认既成事实，有主动妥协之感，又无形助长西藏地方亲英势力的“独立”气焰。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地位也因中央的处置方针再次下降，其处境更加尴尬。因此，国民政府多年来对藏事努力的成果多付之东流，中央威信严重受损。

一、无兵可用？

此时，国民政府真的是无暇西顾，无力、无奈吗？有史料称蒋介石曾说“此时对藏似不宜用兵”^[2]。应该注意的是，这条指令发出的时间为1946年5月5日，并非解放战争的反攻阶段，此时的“不宜用兵”并非不能用兵，更非无力、无奈，而是有其他考量。

历史并非如此简单。1946年11月15日，国大正式召开，蒋介石认为“国民大会开幕，此次为革命史上最艰难之创举，与划时代之新页也……国民大会今已开会，共党一年来联合其他党派以孤立本党、围攻政府之阴谋，已被我完全击破。”^[3]在12月28日的日记中，蒋介石还谈到“国民大会圆满完成制宪任务，国内外对本党之信誉为之大增，此为30年来奋斗之结果。”^[4]应该说，他此时的处境要比1942年“外交局事件”时好得多吧。须知，当时他对西藏驻京人员的斥责，调动青康军队的决心，乃至飞机轰炸的威胁，可是在日寇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做出的。

需要再说明的是，1947年5月，正处于解放战争战略防御期，国民党军队在与人民解放军的战争中尚处于优势地位，同年3月，蒋介石心腹胡宗南攻占延安城，手握40万国民党军队横行陕甘宁青。此时蒋介石为掌控新疆局势，陆陆续续地往新疆派驻10万军队。^[5]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蒋介石在西北边疆民族地区军事力量的上升期和政治权威的高峰期。因此，蒋介石若有心，是完全有能力快速运兵到西藏助热振活佛复位的。

其实，热振事件发生后，最终在厘清西藏局势时，保密局奉蒋介石之命，已有预备方案，准备武力干预。^[6]而且，文官长吴鼎昌认为可以“密令马步芳或刘文辉派兵二三千作进驻昌都态势”，

¹ 本文刊载于《中国藏学》2019年第2期。

² 作者：喜饶尼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冯翔，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毕竟藏军兵力仅有 6000 人，无作战能力，“如无外援，必可不战而屈”。^[7]这种情况，何以放弃？

细思极恐，过去史料的欠缺，竟然导致了对这段历史的误判。

二、南京的争论

1946 年 4 月 20 日，驻拉萨的军统负责人魏龙密报，“西藏内部矛盾百出，摩擦日烈”，由此得出他的结论：这是一举解决西藏问题的好时机。^[8]据报，魏龙手下的情报人员侯国柱与热振活佛来往密切，在两人的交谈中，热振表示“本人之潜伏势力相当雄厚”“如中央军队能入藏则所需军粮及派遣向导均由本人负责”“成功之后本人当即通电拥护中央，对外交之态度则由中央决定……西藏之建设则以不违背西藏宗教为原则并请中央派员指导”。^[9]可以说热振的表态非常符合国民政府对边疆治理的期待，这些秘密谈话也一定给魏龙以极大的信心，由此认为应该帮助热振复位，避免西藏地方政府落入他人之手。^[10]

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良鉴另有他见，认为“热振下台已久，势力渐衰”^[11]；提出中央政府打交道的对象应该首先是西藏地方出席“国大”的代表，认为他们才真正“负有商谈藏事任务”，并且“在现阶段下应以藏政府之实力派为对象”^[12]。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持有类似意见。1946 年 5 月 30 日，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徐认为热振派实力难堪大任，更重要的是“查自我抗战胜利后，西藏政府态度转变甚大。举凡拒绝英人价售存印军火，拒绝英人领土要求及派代表出席国民大会均足证明对中央倾向之意”^[13]，认为中央对藏政策不能将宝押在一人身上。他提到“查热振系前任摄政，自卸职后时谋复位而未果。——中央如欲援助在野之热振以推翻现在西藏政权，诚恐热振力量薄弱，事机不密，易为西藏政府发觉，则不但不能收预期之效果，反而引起西藏当局对中央之疑惧，进一步求保护于英人。”^[14]

徐永昌也认为最佳策略是先与西藏地方出席“国大”的代表商讨相关事宜，但不拒绝对热振的支持，“对于热振方面亦应善予抚慰，并暗中援助……热振应先尽量暗中寻求党羽，秘密扩张势力，但不能轻举妄动”。^[15]如果西藏地方政府不遵照中央决议，则“应飭热振派遣亲信可靠之代表前来，共同策划秘密供给军火之运输路线”。^[16]

令人颇感好奇的是，国民政府要员罗良鉴和徐永昌为何持有如此相近的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有关^[17]。1946 年 2 月 21 日，蒋介石亲自向外交部打招呼，对沈宗濂 2 月 8 日要求伴同西藏地方出席“国大”的代表团内返一事做出指示：“此事甚关重要，即希迅与酌办为要”。^[18]4 月 7 日，沈宗濂陪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国大”代表团抵达还都不久的南京，这意味着作为蒋介石亲信的沈宗濂，可以在南京全程、近距离地介入此事的讨论，并施加他的影响。7 月 9 日，沈宗濂向蒋介石呈交了一份长篇报告，而报告的批注上显示了蒋介石“赐阅全文”^[19]，可见在藏事方面沈宗濂对蒋介石的影响。

作为处理藏事的一线高级官员，沈宗濂在此长篇报告还写道：“藏政府内热振之旧部业已撤换殆尽，兹进一步征收热振所藏之枪械，热振感觉不安，情急求援，自在意中。前弟在藏时，曾与热振密切联络，惟细察其为人贪而无谋，左右亲信亦乏才能，除非中央予以实力援助，无望复位。但自下国内与国际情势是否适宜以武力解决藏事，似有从长研讨之必要。”^[20]可见，沈宗濂对西藏地方政府和热振抱持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其关键原因，恰是因为他希望由索康·旺钦才旦对西藏地方政府进行改组。而索康·旺钦才旦正是罗良鉴、徐永昌口中的“实力派”，徐专门谈到：热振势力远弱于索康·旺钦才旦。他们无疑是受了沈宗濂的影响。实际上，魏龙在报告中就曾提到，沈宗濂在藏时就开始部署支持索康·旺钦才旦改组西藏地方政府的计划。魏龙对这一计划表示质疑，认为“实行虽易，而难收实效”^[21]。

三、选择性“内向”

上面提到的索康·旺钦才旦就是本文探讨的人物。国内外学界对此索康·旺钦才旦的讨论不多,主要局限于对其家族的介绍上,如毕达克(Luciano Petech)的《西藏的贵族和政府(1728-1959)》^[22]、郭卿友编的《民国藏事通鉴》^[23],巴桑旺堆的《关于一份西藏贵族名录档案——兼述10户大贵族家族历史传承》^[24];也有部分提及索康·旺钦才旦政治活动的著作,如周伟洲、周源主编的《西藏通史·民国卷》(上)^[25]有提到索康·旺钦才旦在康藏纠纷中的角色,陈谦平主编的《西藏百年史研究》(中册)^[26]简略记载索康·旺钦才旦主持下的索康家族对热振活佛的敌意,戈尔斯坦(Melvyn Goldstein)的《喇嘛王国的覆灭》^[27]则叙述了索康·旺钦才旦在“外交局”期间的一些动作。

如我们所知,索康·旺钦才旦是颇具争议的“外交局”俗官负责人,索康是世家名,藏名是罗桑巴登,有一个汉文名字叫汪启荣。^[28]他与在西藏的汉族人应该说打交道比较多。这源于其家族索康府的临街铺面,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盛极一时的汉商北京商行(其实这些商店的老板并不都是北京人,而是河北人)。主要销售京津和江浙出产的绸缎、瓷器、古玩,工艺摆设玻璃器皿等,他们也购进西藏的羊毛、牛尾、牛绒等销往内地或出口国外^[29]。索康·旺钦才旦被认为是西藏地方的实力派,其长子索康·旺钦格勒是现任噶伦,其次子是一位研读过国民党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三民主义的藏军代本;另外,昌都总管宇妥及西藏出席国大首席代表古桑子(即凯墨)等,皆为索康·旺钦才旦的姻亲。这些关联都指向噶厦“幕后的操纵者”正是索康·旺钦才旦。^[30]号称“西藏通”的英国人黎吉生与沈宗瀚的看法相似,也认为“噶厦在很大程度上被他(指索康·旺钦才旦——笔者)的意见左右,并将事务交由他安排”^[31]。

沈宗瀚在西藏时间不长,与索康扎萨如此信任,应该与沈刚到西藏,急于寻找西藏方面可依赖的人有关,而索康恰是噶厦中一位“欢快而又聪明的官员”。^[32]加之,沈宗瀚认为索康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还是有头脑的。如,他认为“麦克马洪线”问题是英国“大虫吃小虫”的行为^[33]。索康要求英国立即撤退其在色拉关南部达旺地区、锡昂(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和门尼克莱北部察隅河流域所设立的一切兵营和哨所。^[34]再如索康之子索康·旺钦格勒曾密告沈宗瀚只要抗日战争有转机,他对中央即有拥护表示。^[35]

其实并非只有沈宗瀚这样认为,国民政府官员中与索康·旺钦才旦打过交道的,多认为其“内向”,对噶厦有操控能力,比已经失势的热振活佛强得多。时任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陈质平报中央“闻最近拉萨举行之西藏全体政治会议席上,现任外交局长索康札萨曾极力主张外交应归中央政府,外交局应即撤销。如不从其主张,彼即辞职。”^[36]他在电文中还特意介绍了索康家族的影响力。

显然,索康·旺钦才旦确实有其特殊的才能和影响力。

著名藏学家柳陞祺先生曾作为蒙藏委员会办事处科长,在西藏待过几年。他如此评价索康:“札萨则与内地的接触较多,所以对中原方面,尤其是川康一代的政情人事,较为熟悉,并且他还说得相当好的一口四川话。现在他担任的职务,是外务局的主管,为人除精明干练之外,还带上充分东方味的所谓圆滑。他有三个已成年的公子,都整整齐齐”。^[37]柳先生还特别谈到索康家族的3个儿子,一个是噶伦,一个是代本,一个是僧官。扎萨夫人是拉加里家族(据传就是松赞干布的后裔),“所以这三兄弟不但是僧、俗兼有,并且还是文武俱全。……索康噶伦之妻,是上文提过的耶谿(达赖家属)之一的宇妥台吉的亲妹。这宇妥台吉又娶的是索康噶伦的亲姐,所以是亲上加亲。碰巧索康札萨与宇妥台吉都曾当过多年的昌都总管,所以对这东路的情形最为熟悉。索康札萨的亲弟,是出赘给凯墨巴为婿的,这凯墨巴一般都用房子名改称为古桑子,亦是一个出赛南巴的大族。按照西藏奇特的风俗,这家便以这人赘的索康为正统,现在已当到了札萨,其职务为盐茶局主管。他的妻弟,即凯墨巴之本宗,便是那第二席的扎什戴琿,所以这扎什营的两名

戴琫，都出在这一个集团内。而尤其有趣的，是这凯墨巴家的女儿，又嫁给了另一大族帕拉为主妇。这帕拉又是被公认的德本密宗之一，有三兄弟。居长的是僧官，就是现任重业秋波（又译作仲译钦莫——笔者注）。第二位是俗官，即娶凯墨巴小姐的，达赖卫队营的统领，即所谓古松戴琫，地位比扎什戴琫尤高，是一切戴琫之首席。第三位管理家务，就凭这帕拉两兄弟都当到达赖身前的一文一武，其重要性已经可观，再加上这辗转牵连的许多头等古札与权要的关系，这集团的实力亦就不言而喻了。”^[38]

汉僧碧松，即后来的拉萨国立小学校长邢肃芝也和他熟悉，得到过他的帮助。国民政府派往西藏接替专使行署留藏人员蒋致余的高长柱在昌都一带遇阻时也提到“索康与私人情尚称融洽，除馈赠给养物品计值四百余元外，复迭次托其代办给养各物，均经办到”。^[39]他还一度表示据昌都及藏方蔡翻译密称：“索康近以公私环境日感困难，态度回变，已建议噶厦迎弟，确有八九成希望”。^[40]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章与其关系也较好，能够就一些敏感问题交换意见。^[41]

显然，索康很注意与中央官员拉近关系。沈宗濂看重他，也是合乎情理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戴新三的日记里则说得更清楚：“曾任昌都总管现任外交局总办索康，现拟利用中藏僵局，在昌都造成局势，如中央对藏用兵，彼即向[相]机归顺，复籍中央力量，达彼充任藏王之目的，兹将最近所闻情形录述如次：

（一）新近赴昌都接充总管之宇多，乃索康之婿，此次赴康，携带辎重甚多，偕往人员如绒扎巴、擦底娃，将月令色等均其亲戚，现驻康区各代本，多系索康旧部，观其动作，似有同系人物集中西康，使逐渐形成一种政治局面之倾向。

（二）宇多之妻，传将于藏历六月由索康之子汪青送往昌都。三、四月前汪青曾宣称拟赴内地游历，有人询渠为何不向藏政府要求名义，渠讥其人为不懂政治。是汪青送妹赴康，乃系掩护作用，其目的当在乘机逃赴内地，做政治活动。

（三）据与索康友善之汉僧密悟^[42]云：索康拟籍中央力量图谋藏王位置，故早已与其子汪青等在噶厦立据分家，盖免政治失败累及子孙，其目的当在乘机逃赴内地，做政治活动。现彼在藏极力收买黄金，以备一旦时机成熟，即抛弃拉萨产业驰往昌都，并邀密悟同往，为彼担任汉文秘书，负草拟文电之责。

（四）前年琼让代本革联[职]充军一案，计共有廿三人联名，均未供出，索康似在其中，彼等系反对西藏现行政制，主张政教分治，不许少数垄断政权，实为继龙夏而起之内政改革运动。索康此次果在康区树立局面，势必将此廿三人，重新团结，贯澈[彻]彼等之政治阴谋。总之，索康一系势力雄厚，其言论行动，殊堪注意，最近拉萨盛传玉树增兵，风声鹤唳，或系彼等张大其词，俾做政略上之运用，亦未可知也。”^[43]

于是，沈宗濂“认为西藏噶伦中以索康·旺清格勒和噶雪·曲吉尼玛实力最大，而旺清的父亲、现任外交局长索康·旺钦次登札萨系幕后操纵者。索康札萨对蒋介石‘素极崇敬，愿在中央领导下改革西藏政治，推行新建设’”。^[44]

于是，沈宗濂最终与索康·旺钦才旦达成了秘密协议：

“（一）西藏外交完全由中央主持；（二）西藏军队由中央负责供给军械派员训练；（三）西藏国民党由索康负责组织。”^[45]这一口头“秘密协议”可谓沈宗濂按蒋介石的胃口打造，既不违背蒋在1945年8月发表的将给予西藏地方“高度自治”的声明，也未触及蒋介石对于西藏地方事务的底线，更重要的是它符合蒋介石对于“训政”时期国民党的组织要求。沈宗濂还强调了索康·旺钦才旦的诚意，称此时索康已前往边界调查英国侵占中国西藏土地的情况，必要时索康·旺钦才旦可以晋京，面见蒋介石，当面聆听训令。他本人也提出愿意去英国协助中国驻英大使要求英国军队^[46]撤出西藏。^[47]索康还与黎吉生谈到过，在同中华民国政府商谈交涉有关问题时，最好以目前的状况为立足点，不要依据1914年条约。^[48]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还有

人认为“西藏当局，如外事局长及噶伦等深知英帝侵略之害，彼等且有规复大吉林(岭)之意。若我势力(力)扩入，不难使其内向。”^[49]

四、沈宗濂的退意

事后看，沈宗濂对索康·旺钦才旦真实政治态度的认知存在明显的偏差，对他的谋略野心也认识不足，仅凭借他对蒋介石“素极崇敬”，并且“能通汉语”^[50]就认定索康倾向中央是极其武断且片面的。毫无疑问，沈宗濂对索康·旺钦才旦的支持，还包含他对自己前途的考虑。

沈宗濂到藏初期，雄心勃勃，有着极大的抱负。但数月后，他收到蒋介石让陈布雷给他的复电，谓：“奉委座指示，目前国内局势复杂，故西藏问题只能维持现状，不宜多事更张，吾兄才华卓著，年来在藏多有建树，弟所钦佩，唯按之现实，只能以无事为大事，以无功为有功。区区愚见，谅蒙明察。”沈宗濂是聪明人，接到这个复电后，知局势既已如此，事已断不可为。自此他心灰意冷，开始有脱身之考虑。^[51]

或许是由于双方皆受过精英教育的背景，沈宗濂在藏期间与几位英国官员的私交不错，他们也这位哈佛毕业颇为欣赏，在闲谈中，沈宗濂数次表达了他不愿在拉萨工作的想法。“他不喜欢拉萨并且认为这里对身体健康不利。他希望早点结束在这里的工作，然后作为经济专家在战争结束后自由地参与更大范围的讨论。”^[52]作为主任秘书接替沈宗濂的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章也持类似的想法，“沈宗濂感觉藏事棘手，亟思早日脱身。”^[53]沈宗濂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提出，由于身体原因，“请调回中央工作”^[54]。沈宗濂在南京期间，曾陪同西藏地方代表及嘉乐顿珠晋謁蒋介石。此前，他还拜访了一向关注边疆事务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和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陈布雷，谈及他在拉萨工作一年有余的情况与他对治藏问题的认识。他表示，既然在藏事方面不宜有所行动，而他自己又患有心脏病，不适合久居高原，因此请陈布雷代为向蒋介石表达辞职之意。蒋介石同意沈不妨暂时休息，以后将另有任用。1947年初，上海市长吴国桢邀沈任市府秘书长，此项任命自然是出自蒋的授意。^[55]

来自另一个渠道的消息表明沈宗濂的内心想法。据嘉乐顿珠回忆：他在南京得知热振死讯后，即感觉应该把热振要求其传达的口信（依靠中央，争取复位）转告蒋介石。但是，沈宗濂建议他不要这么做。沈认为覆水难收，还提醒嘉乐顿珠如果告诉了蒋介石，消息泄露，其母亲和达赖喇嘛都可能受难。对此，嘉乐顿珠心生芥蒂，认为沈完全站在达扎的一边，而且他一夜暴富，在没有足够资历的情况下被提拔为上海市长（沈宗濂并非市长——笔者注），可能收受了贿赂。^[56]

沈宗濂的这一系列举动显然带有甩包袱之意，他很清楚一旦中央政府决定支持热振活佛重掌大权，那么与拉萨各贵族、寺院均有良好关系的他必然被再次派往拉萨，这与他“作为经济专家在战争结束后自由地参与更大范围的讨论”的意愿背道而驰。而如果在他的影响下，中央政府决定支持索康·旺钦才旦，以较为缓和的姿态改组西藏地方政府，那么西藏的局势就会平稳许多，他也不必重返拉萨。甚至，沈宗濂还进一步提出，在国民代表大会之后，“宣慰专员似以章嘉活佛充任为宜”^[57]。直到1947年5月初，沈宗濂还在建议蒋介石利用热振活佛之事，实力支持索康扎萨改组西藏地方政府。而索康颇有计，婉转表示“此事尚待考虑”。^[58]

五、最后的机会

1946年8月14日，拉萨站军统负责人魏龙转来热振活佛给蒋介石的急信，信中称：“目前所存实力尚堪一战，惟于时机不知是否得当，否则取当晋京一行以避其锋。”^[59]据此推断，热振活佛已经在忧虑个人的安危，同时也认为他的实力并不逊于达扎，但还是需要征询中央政府的意



见，确保其采取行动时能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而沈宗濂对此则表现得漫不经心，认为如果热振个人的安全受到威胁，可以派出飞机前往拉萨“示威”。^[60]

军统内部也认为热振活佛有能力复位。从驻拉萨的魏龙及侯国柱的报告中都可以看出，他们对在中央的帮助下使热振成功复位抱持较为乐观的态度，并认为：“索康及其党羽，均为显著之亲英派，彼等对英之关系绝难放弃，而在彼策划下改组藏政府之后，恐仍将采取骑墙政策，对外交权及国军之入藏，彼亦不能确切保证。故索康之计划实行虽易，而难收实效”。他们指出，要想彻底解决西藏问题，“阙为扶助热振之复位”。他们认为，热振复位，“系以挽救将沦于亲英之西藏宗教为重心，如能成功，则政令之推行可由我中央派员实际主持，外交问题亦均可由中央决定，绝无建立中英双方亲善关系之顾虑”。他们坚持，“西藏问题，从各方面观察，俱以从热振方面着手较为有利。而且确有把握”。^[61]之后的事件发展也确实印证了军统拉萨站的情报是正确的。查询材料证明，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也持同样意见。

1946年9月5日，沈宗濂的意见得到肯定。作为蒋介石亲信和前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吴忠信与总统府文官长吴鼎昌连日商讨后，基本上同意了沈宗濂与徐永昌的意见，先与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西藏代表商谈。吴忠信有这种意见并不奇怪，我们在研究中注意到，他在藏期间就听到了一些关于热振的负面信息。如1940年12月27日，孔庆宗、朱章等人往晤热振。在朱章看来，热振活佛频以“南京有无拉萨大”及“内地是否到处皆山”相问，其作为“西藏一代之权威，于内地情况，尚不能了然于怀也”，^[62]这与后来吴忠信对热振的观感颇为类似，很难说朱章等人未就此与吴忠信交换过意见。2月28日，吴忠信答宴热振时，发觉“热振实心亲汉，人亦天真”。^[63]但等到4月12日，彼此再见之时，吴忠信对热振的印象则开始变化，“以主全藏政局之人，而常识缺乏如此，可为浩叹。”^[64]并对其处境感到担忧，认为“余代热振危矣。且热振贪财之名传遍全藏，复又好色，结怨必多，余不知其何以善后也。”^[65]显然，他们已对热振活佛在西藏地方的统治力失去信心。

这期间，热振活佛其实一直在等待中央政府的决定。当藏军前来抓捕时，热振活佛并无丝毫反抗之意。国民政府此时亦毫无作为，遂引起西藏地方政府内部亲中央势力的不满。同时，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也报告称这是一场亲英派与亲汉派之间的斗争，如果中央没有后续行动，“则不仅丧失一般藏胞对中央之威信，即十余年来对藏联系工作之成就亦将毁于一旦”^[66]。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章在后来感慨万分地说：“自此事发生，办事处将所得消息陆续电告沈宗濂转呈蒙藏委员会，请其注意尽速策划有效方法，解决纠纷，因此次达札与热振之争，亦即我国与英帝国主义在藏势力消长之关键，不可忽视。在色拉寺与嘎雪巴相持中，喇嘛一面抗拒，一面以全体僧众名义写信给办事处，请转呈中央，速派军队和飞机进藏，援救热振。在藏汉人则要求中央，无论如何要设法保护热振的生命安全。我向南京报告，建议一面设法调解，一面派军队在西康昌都一带，往来游戈，遥为声援。一时均未得到蒙藏委员会或沈宗濂的答复和指示。”“西藏地方政府任意颠倒事实，目无‘中央’不惜与之决裂，则是昭然若揭。我致函沈宗濂痛论此事，并提出辞职，未得答复。”^[67]

直到1947年3月，国民政府方面才出现了新的态度转向。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的陈诚第一次公开呼吁改变对藏政策。他断言，目前的西藏地方实际上是在推进分裂运动。他认为达扎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提交的材料已充分揭示了其真实意图。此外，拉萨现在正打算派出另一个代表团前往印度，参加“泛亚洲会议”。他提出，南京政府支持热振活佛重掌摄政之位的时候已经到了^[68]。

1947年4月25日，喜饶嘉措大师致信蒋介石，与陈诚的看法相似，也认为热振被捕背后其实是中英两国的竞争，此时“亲华派之处境当极困难，若不予以援助则三大寺等亲华派之信心将丧失”。^[69]从后来的情况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喜饶嘉措大师的信对蒋介石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蒋

介石日记》中，我们看到他对喜饶嘉措大师的治藏意见是赞同的，认为“颇有见解”。亲信陈诚的意见与大师不谋而合，致使蒋介石立即要求保密局郑介民拟定藏事解决方案。

次日，国防部准备了一份详细的军事行动计划和军事地图，等待蒋介石批准。在这个计划里，在甘肃的两个国民党控制的装甲部队将调集到青海南部，同时刘文辉的部队和康区当地的武装力量向西开进，占领拉萨控制的金沙江西岸。此外，国防部还积极建议蒋介石，选择一名具有军事背景的合适的官员担任驻拉萨的代表，以控制军事行动后的局面。^[70]

但是，一切都晚了。1947年5月8日，热振活佛圆寂。

六、研判失误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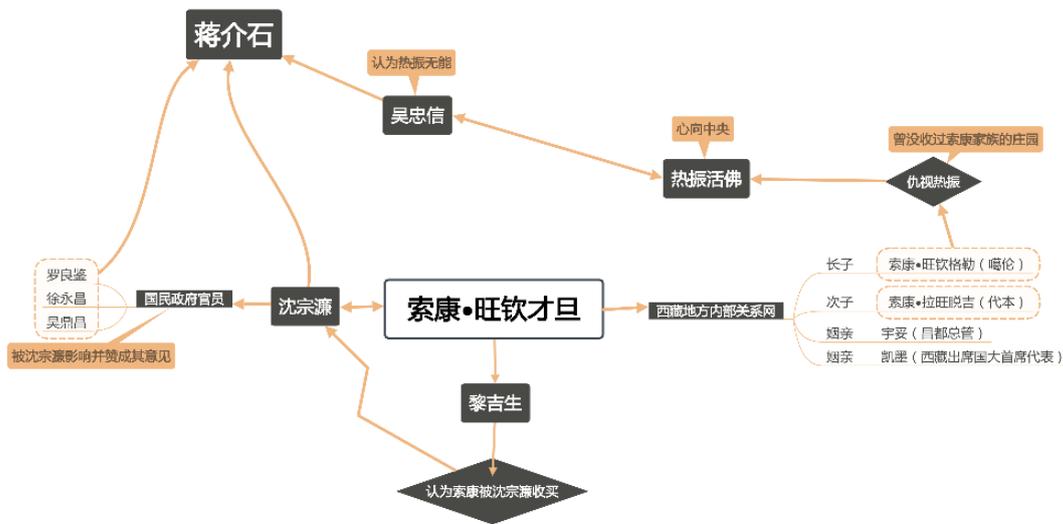
事件发展到这一步，原因很多。而沈宗濂作为处理藏事的一线高级官员自然难辞其咎，对于热振活佛被“抛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热振事件”及其危机出现前，他为了实现自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的计划可谓煞费苦心，甚至不惜利用蒋介石对他的信任来夸大西藏地方政府的“内向”态度以贬损热振活佛。

另一方面，沈宗濂推动“改组”西藏地方政府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为了让他更快地脱离有关西藏的事务，返回内地从事他本职的经济工作，以实现他个人的政治抱负。沈宗濂的这一想法在他与达扎的私下会见中也曾向其表露，甚至还被英国人所获悉，“据进一步汇报，沈先生说怀疑他是否还能像摄政一样总是参与国事，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希望能够返回内地，拥有他之前的权力”^[71]。如果支持热振复位，那么沈宗濂将很有可能不得不返回拉萨，按照热振活佛承诺的“请中央派员指导”^[72]。我们从档案中看到：沈宗濂认为“热振在藏势难复位。中央只宜对其虚与委蛇，以为应付达札之一工具而已”。^[73]在郑介民、吴鼎昌等主管官员接到西康省刘文辉主席关于热振已派代表的报告后，仍在质疑“其本身究能代表热振何程度，颇成问题”^[74]“该代表两人实系西康商人，究能代表热振与否，亦颇成问题”^[75]，而这些怀疑都提到是沈宗濂的看法。最终，蒋介石未能见到热振活佛的代表，使热振活佛寄希望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条渠道被堵死。

沈宗濂最大的问题在于他说服蒋介石选择了索康·旺钦才旦。对此，任乃强先生在其《检讨最近藏局》一文中直率地指出：“三十二年我政府召回孔庆宗氏，代以委员长侍从秘书沈宗濂，以为便可挽回颓局。殊沈氏昧于藏情，其颓势更较孔氏为速。未几即因无法立脚，潜回内地教书，仅留小职员数人在藏，闭门株守而已。”^[76]如果将中英两国的档案和时人的记载对比来看，那么自然地得出以下结论——索康·旺钦才旦是政治上的“双面人”。当沈宗濂在拉萨时，英驻锡金政治官员霍普金森怀疑索康·旺钦才旦“处在中国人的掌控之下”^[77]，中国驻印度总领事馆的情报也显示索康“极力主张外交应归中央政府，‘外交局’应即取消，如不从其主张，彼即辞职”^[78]。当英国人黎吉生在拉萨影响渐增的时候，索康·旺钦才旦又不断向黎吉生表达“独立”的愿望。^[79]实际上，明眼人都知道“索康扎萨在藏素以亲英为名”^[80]。但直到1947年，驻藏办事处还在用密电报告沈宗濂，索康扎萨的近况。^[81]

我们从索康扎萨与周围关系入手，绘制了一幅简图，比较清晰直观地展示了他何以有如此影响力的（见图）。最终这一切影响了国民政府中枢对热振活佛的态度，对西藏“热振事件”研判的准确性。

1947年“热振事件”发生之后，国民政府此时的心境可以用与热振活佛个人关系极好的吴忠信的态度来做一说明，即尽管感慨“此次变生仓卒，中央竟因交通及力量所限，不及援救，此对热振实抱无穷遗憾也，余与热振私感尤深，此种痛恨不能忘也”，^[82]但骨子里仍然认为“现在热振势力毫无，且其名誉太坏，以中央现在内外之环境，决不能亦不便对藏办诸武力，尤其西藏出席国民大会代表现在内地，而印度又已独立，西藏局势有将转之可能，更不能扶助失势之热振，而得罪有实力之现藏政府”。^[83]



实际上，热振活佛的去世，对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影响极大。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章甚至提出辞职一事。有人自拉萨撰稿，提到“自从热振变发生之后，全藏百姓莫不引颈翘首中央之救助，结果中央对藏政府说的硬话的电报都没有来。”^[84]这使得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处境更加尴尬，中央威信严重受损，特别严重影响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因此，我们认为这不是国民政府是否有能力支持热振活佛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支持的问题。影响热振事件走向的真正原因是对索康·旺钦才旦的误判。这也充分说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中不同政治倾向的人是复杂的、多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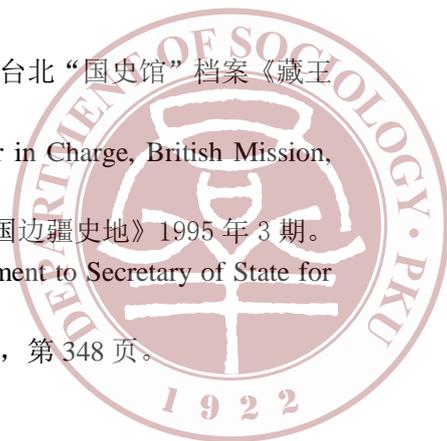
历史客观存在，学者也多秉持公正的态度，但如何还原历史的真相，则必须依靠扎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既包括档案，也包括需要甄别的口述史料。西藏“热振事件”的幕后，给了我们更多的启示。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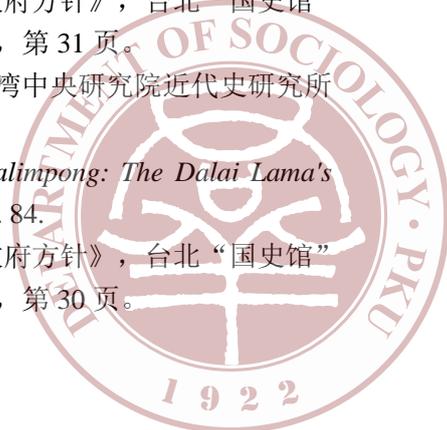
- [1] 如陈谦平：《“热振事件”与战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民国档案》2006年第01期，第90-98页。陈谦平主编：《西藏百年史研究》（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40-460页。周伟洲主编：《西藏通史·民国卷》（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378-388页。
- [2] 《西藏政变续报传热振将遭毒手中央应严电停止军事行动并派兵赴青康藏边境》，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四），典藏号：001-059200-0012，第40页。
- [3] 《蒋介石日记》，1946年11月16日。
- [4] 《蒋介石日记》，1946年12月28日。
- [5] 熊坤静：《新疆和平解放的前前后后》，《党史文苑》2010年第7期，第46页。
- [6] 《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呈西藏事变之内情与对策》，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三），典藏号：001-059200-0011，第66-68页。
- [7] 《吴鼎昌关于热振被捕情报的签呈》，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三），典藏号：001-059200-0011，第68页。
- [8] 《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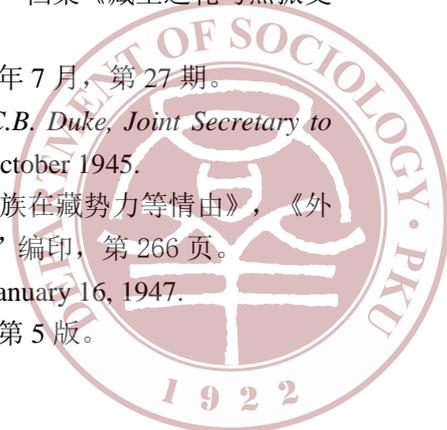
- [9]《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16-18页。
- [10]《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11页。
- [11]《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24页。
- [12]《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23页。
- [13]《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21页。
- [14]《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21页。
- [15]《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21页。
- [16]《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21页。
- [17]沈宗濂（1898-1978）：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后来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任总务司司长，1941年末，沈宗濂调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四组任秘书，为蒋介石出谋划策。1943年10月，沈宗濂被蒋介石派任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后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
- [18]《蒋主席饬外交部，转知印督，驻藏沈处长将伴同藏籍国大代表赴新德里》，《外交部档案业书——界务类》第五册西藏卷（一），台北“外交部”编印，第268页。
- [19]《沈宗濂呈西藏政情及对策并附西藏前任摄政热振呼克图函》，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40页。
- [20]《热振呈达札对其妒视益深近迫益急及派代表晋谒请示应付藏政府方针》，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27页。
- [21]《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11页。
- [22][意]毕达克：《西藏的贵族和政府》，沈卫荣、宋黎明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
- [23]郭卿友编著：《民国藏事通鉴》，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
- [24]巴桑旺堆：《关于一份西藏贵族名录档案——兼述10户大贵族家族历史传承》，《中国藏学》2014年第S1期。
- [25]周伟洲、周源主编：《西藏通史·民国卷》（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
- [26]陈谦平主编：《西藏百年史研究》（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 [27][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
- [28]邢肃芝：《雪域求法记》，三联书店2003年，第110页
- [29]廖东凡：《拉萨掌故》，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
- [30]《沈宗濂呈西藏政情及对策并附西藏前任摄政热振呼克图函》，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59页。
- [31]FO 371/53614, From the British Trade Agent, Gyentse and Officer in Charge, British Mission, Lhasa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Gangtok, 3rd April 1946.
- [32]房建昌：《有关西藏烟草的嗜吸及鸦片之禁的若干史实》，《中国边疆史地》1995年3期。
- [33]FO 371/46121, From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24th June 1945.
- [34]陈谦平：《民国对外关系史论1927-1949》，三联书店，2013年，第348页。



- [35] 《沈宗濂致陈布雷函电》，台北“国史馆”档案，0592/4417.01-03，藏务，微卷 419/1841，1945 年 4 月 23 日。
- [36] 《陈质平为西藏派遣国大代表等事复外交部电》，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七册，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 年，第 3002-3003 页。
- [37] 柳陞祺：《柳陞祺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474 页。
- [38] 柳陞祺：《柳陞祺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474-475 页
- [39] 夏军选辑：《高长柱赴藏途中日记节选(上)》，《民国档案》2013 年第 1 期。
- [40] 夏军选辑：《高长柱赴藏途中日记节选(上)》，《民国档案》2013 年第 1 期。
- [41] 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民族出版社 1984 年，第 133 页。
- [42] 密悟：（1904-1966）俗名霍履庸，在西藏颇有影响之汉僧。曾先后在甘孜大金寺，西藏哲蚌寺学经，曾获“拉让巴格西”。1949 年后，曾化名志清法师，为西藏和平解放做出过贡献。
- [43] 王川：《戴新三 1943 年〈拉萨日记〉选注整理与初步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2 期。
- [44] 陈谦平：《民国对外关系史论 1927-1949》，三联书店 2013 年，第 422 页。
- [45] 《热振呈达扎对其妒视益深近迫益急及派代表晋谒请示应付藏政府方针》，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28 页。
- [46] 指驻江孜和亚东的英国贸易代表处的卫队。
- [47] 《热振呈达扎对其妒视益深近迫益急及派代表晋谒请示应付藏政府方针》，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30 页。另见 FO 371/53614, From the British Trade Agent, Gyentse and Officer in Charge, British Mission, Lhasa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Gangtok, 3rd April 1946.
- [48] FO 371/41589, From H.E. Richardson, Points arising from discussion with the Tibetan Foreign Affairs Bureau on 16 September 1944.
- [49] 秦和平：《一个“反帝欲汉藏两族和睦而爱国佛教者”——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密悟(志清)法师》，《社会科学研究》2015 年第 2 期。
- [50] 《热振呈达扎对其妒视益深近迫益急及派代表晋谒请示应付藏政府方针》，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28 页。
- [51] 张令澳：《侍从室回梦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年，第 151-153 页。
- [52] FO 371/41585,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4th October 1944.
- [53] 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第 108-140 页。
- [54] 《热振呈达扎对其妒视益深近迫益急及派代表晋谒请示应付藏政府方针》，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31 页。
- [55] 张瑞德：《「欽差」使命：沈宗濂在西藏(1943-194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7 期，第 59-96 页。
- [56] Gyalo Thondup, and Anne F. Thurston, *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pong: The Dalai Lama's Brother and His Struggle for Tibet*,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5, p. 84.
- [57] 《热振呈达扎对其妒视益深近迫益急及派代表晋谒请示应付藏政府方针》，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30 页。



- [58] 《陈锡章致沈宗濂电》，台北“国史馆”档案《中藏关系》，卷 60/E38/023，1947 年 5 月 8 日。
- [59] 《沈宗濂呈西藏政情及对策并附西藏前任摄政热振呼克图函》，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59 页。
- [60] 《沈宗濂呈西藏政情及对策并附西藏前任摄政热振呼克图函》，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62 页。
- [61] 《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11 页。
- [62] 朱少逸：《拉萨见闻记》[M]，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第 12、15 页。
- [63] 《吴忠信入藏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271 页。
- [64] 《吴忠信入藏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 299 页。
- [65] 《吴忠信入藏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 298 页。
- [66] 《西藏政变续报传热振将遭毒手中央应严电停止军事行动并派兵赴青康藏边境》，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四），典藏号：001-059200-0012，第 25 页。
- [67] 陈锡章：《西藏从政纪略》，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第 108-140 页。
- [68] 《陈诚呈为求西藏内向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二），典藏号：001-059200-0010，第 41 页。
- [69] 《喜饶嘉措呈援助热振办法》，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三），典藏号：001-059200-0011，第 51 页。
- [70] 《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呈西藏事变之内情与对策》，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三），001-059200-0011，第 66-68 页。
- [71] FO 371/46123, SECRET NEWS REPORT, British Mission, Lhasa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19th July 1945.
- [72] 《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11 页。
- [73] 《西藏政府派兵拘热振及色拉寺僧徒暴动情形》，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二），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68 页。
- [74] 《西藏政府派兵拘热振及色拉寺僧徒暴动情形》，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二），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68 页。
- [75] 《西藏政府派兵拘热振及色拉寺僧徒暴动情形》，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二），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65 页。
- [76] 任乃强：《检讨最近藏局》[J]，《康藏研究》（成都）1949 年 7 月，第 27 期。
- [77] FO 371/46123, From A. J. Hopkinson, British Mission, Lhasa to C.B. Duke, Joint Secretary to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New Delhi, 31th October 1945.
- [78] 《驻加城领馆呈藏代表经印赴京之艰难、霍金森之挑拨及索康家族在藏势力等情由》，《外交部档案业书——界务类》第五册西藏卷（一），台北“外交部”编印，第 266 页。
- [79] IOR L/P&S/12/4197, Richardson Report of Lhasa Mission in 1946, January 16, 1947.
- [80] 《荣增打扎摄政以来西藏一瞥》，《申报》，1948 年 2 月 15 日第 5 版。



- [81] 《陈锡璋为索康和西藏代表往晤尼赫鲁请助独立等情致沈宗濂电》，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七册，第 2867-2868 页。
- [82] 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吴忠信先生日记》，1947 年 5 月 20 日，系列名称：一般档案，馆藏号：一般 230/5617.2。
- [83] 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吴忠信先生日记》，1946 年 9 月 4 日，系列名称：一般档案，馆藏号：一般 230/5617.1。
- [84] 马明孝：《热振是怎么死的》，《西北通讯》第二卷第二期，1948 年 1 月 31 号，第 30 页。

【论 文】

近代有关“西藏问题”的文书写作与认知研究¹

徐百永²

摘要：近代以来，西藏在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和渗透下，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对于“西藏问题”，近代知识精英奋笔疾书，揭露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西藏的渗透以及西藏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边疆治理中突出问题的原因，认为英俄等国的侵略渗透及晚清以来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失误是造成西藏成为“问题”的主要缘由，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解决“西藏问题”，加强对西藏地方的有效治理建言献策。相关认知对于现在中国的边疆治理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西藏；西藏问题；精英；文书写作

近代以来，在西方殖民者的持续渗透和侵略下，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呈现出相对疏离的局面，如何解决中国的边疆危机，巩固主权，近代中国精英阶层展开了对于边疆地区内容广泛的书写，其内容不仅仅涉及边疆族群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生活环境、风俗习惯等，而且就如何解决西藏等边疆地区相对“自主”于中央政府控制之外的局面也积极进行了探索。这些文书写作大大拓展了内地社会民众对于边疆的相关认知，丰富了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中边疆认知的话语和内容，对于近代中央政府处理相关问题也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在近代边疆文书写作中，有关“西藏问题”的撰写是其中比较突出而重要的方面。近代产生的所谓“西藏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清末、民国）所包含的含义并不尽相同，但核心内容都在于近代中央政府如何排除外来列强的干扰，在建构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加强对西藏的有效治理，巩固边疆和领土主权。目前学术界关于近代西藏文书写作的研究与数量繁多的民国文本相比，仍少之又少，较有代表性的论述有：简金生分析了民国时期藏人在涉藏文书写作中所展现出的西藏认知，论述了汉人知识精英在书写中对于西藏女性的“情色化想象”；李健以五本《西藏问题》著作为例，分析了“西藏”概念的涵义；朱丽双分析了民国政府派往西藏的官员对于西藏的文本

¹ 本文刊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 年第 5 期，

²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副研究员。

